

心繫三農的人生記錄（代序）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2008年1月，我為《泰和名人》一書寫了一篇序言，開篇如下：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泰和人的半子，老泰山在1950年代還曾擔任過泰和縣長。1984年新婚後的蜜月，我就是太太老家的「夾皮溝」裏度過的。當時那裏還沒有電，從縣城坐長途汽車到中龍鄉把人放下，再往前就是山間小路了，要走15里。幽幽靜靜，左徊右轉，花香鳥鳴，很是新鮮。這一路走下來，不禁對《桃花源記》裏的描寫有了親臨其境的體會。在接下來的半個多月裏，差不多天天在做客：一個在大學工作的新姑爺來了，在這山裏不是個常見的事；更何況太太的奶奶娘家也在當地，藍姓，老親老友多，還頗具傳奇色彩：她本人參加過土地革命，當過婦女幹部，當年和蔡暢還有工作聯繫；她的大哥曾是地方紅軍的一個軍官，後被污為「AB團」而錯殺，當地一直有他騎馬打槍的故事流傳。加上岳父就是從這片山裏走出去的，後來有了「出息」，鄉親們自然看得起看得重，我作為晚輩回其家鄉，自然就享受「餘蔭」了。在此，我第一次感受了被稱為「客家」的一批老百姓的真誠款待，第一次吃到了擺滿桌子的各種油炸果子；第一次在暑天的黃昏時分，看見田、路之間嫋嫋升起的地氣，溫溫的，人走過去感到軟軟的，又似有似無，我後來意識到可能這就是史書中常常提到的南方「瘴氣」——我離開這片山區的時候，在鼻、唇之間的

「人中」部位，密密地長了一片紅色水泡，大約就是「瘴氣」在我這個祖籍山東者身上的反應。也是在此，我第一次向鄉老詢問地方掌故，和村民肩並肩地看家譜。因此，如果說我在日後的考察中能聽得懂「客家話」，如果說我對江西的閩、廣移民生存環境會有一些自己的體會，如果說我會關注吉泰盆地及其周邊山區的文化差異和不同歷史進程等等，應該說都與這次泰和之行有關係，或者說就此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這樣看來，我的確與泰和的人有緣，與泰和這片土地有緣，才可能千里來相會。

但在當時我還想不到，兩年後我又有幸為岳父的個人回憶錄《實踐雜記》作序。也正因此，我獲得一個先睹為快的機會，細細通讀了全文，受益良多，也百感交集。因此，我想先把親情擺開，只把這篇文章看作一個尋常人的思想產品，再從自己從事江西地方歷史研究的角度，略談個人的一些讀後感。

古話說：「文如其人」。那麼，如果先就作者的身份做一基本確定的話，可以說他是從1940年代末起，在一片「被解放」的南方鄉土環境中被承認、被培養、被重用的當地黨員幹部。相對而言，他在那個時代裏文化程度是不算低的。也正因此，作者在以後的工作中對地方文化多有留心，寫的一手好字，在任何崗位上都可以自己寫工作報告，一直到離休之後，很快又在老年大學的書法班中脫穎而出，無論字或畫，都多次獲獎和展示。包括這部20萬字之多的《實踐雜記》問世，不啻又一個有力的例證。所以我很想先強調的一種體會是：儘管作者從小生活在泰和山地的

移民社區裏，但他只要想「有出息」，就不得不去學文化；一旦有機會走了出去，就不可避免地去接觸和融入吉泰盆地那個更大環境的深厚文化底蘊中。何況從地委黨校學習開始，裏面真正屬於「客家人」的還是少而又少，與之交往的當地幹部中，主要還是吉泰盆地土著居民的後裔，那是一個根基多麼深厚的文化人群啊：至少從兩宋到明代後期，一直在中國的科學文化圈裏發出強音甚至一度執牛耳！所以，我們看看作者寫到他那被打成「AB團」而冤殺的小舅舅以及叔叔蔡文香烈士，都是當過鄉村教師的；我們再看看作者寫到他初當村小老師的報酬竟是薪俸油200多斤，米25桶，鹽25斤，食油40多斤，學生還要輪流送柴送菜，待遇竟然如此不菲！然而在「當門抵風」一年後又深感吃力，不得不和學童一起把設館主教的位置送給深諳鄉村禮數的老先生。這種由口碑和良知構成的評判機制，是在一個長期文化積澱基礎上形成的，久而久之就成了大家公認的「慣例」和規矩，管理著一小塊一小塊彼此聯繫不多的小社區生活。因此我又想起作者曾經屢屢提到家鄉的「約會」，在當年是多麼的有約束力，尤其在如何摘木梓的操作上持戒甚嚴，人人都要遵守。因此近年來我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並不斷強調一個觀點即：將江西簡單地定義為「紅土地」是膚淺的，是只看見幾年之內被強力覆蓋其外的淺淺一層顏色而已，它的深處，是厚厚的「古色」，這塊土地的本質特徵是「有文化」。更準確地說，是有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不是依託近代城市發展起來的新文化）底蘊。這種文化最強調最維護的還是「規矩」，是「體制內運作」而不是「逾矩」。也正因此，這裏成長起來的人在內心是有所持的，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每當時代發生大的搏擊和思想衝撞之時，他們往往以「守成」和「執拗」固守心靈陣地，既可以此自傲、自立，也可藉以排遣對外部世界的不解和難免的心理壓力。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觀察、體會和考量江西的「人」，也許會對近代以來發生在江西的許多現象，以及外部世界對其正面的或負面的各種評價，能有更加深層的認識和解读。

近年來，我讀了不少的老幹部回憶錄，但像作者這樣，四十餘年的工作經歷和用心都與一個「農」字緊密相連的，還真是不多見。從作者的全部工作崗位和性質來看，大致可分為「鄉」—「水」—「土」三大階段：在參加革命初期，是在一個縣的一個區裏搞農村工作，後來是在一個縣城環境中主事，而當時的工作重心無疑是緊抓農業生產，所以他才可以那樣如數家珍地記錄一個農民一年所要做的一道程序的農活，僅如收集和施加各種農家肥為例，今人最難想像的恐怕要數換老壁土肥田和種紅花、肥田蘿蔔了，且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很多農活似乎在今天的鄉村已經成為歷史，現在的「農民」種田既減輕了不少勞動強度，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說也變得更草率、更粗放、更躲懶了，以至於因為化肥和農藥的無限制使用，而使得土壤板結成為一個難以抑制的惡性趨勢。當我們瞭解了50年代基層幹部的主要工作內容後，才會使人體會到原來這個新建的人民共和國從開始就在糧食緊缺的狀態下走過來的，而且越來越緊缺，以至於後來相當一批省份不得不面臨一個「大饑荒」問題。所以那個時期幾乎是舉國抓農業，以至於曾是一個縣的主要領導人的作者，會產生50年代抓農業有「如履薄冰」的感受。即使是帶有向工業化轉變追求的「全民大煉鋼鐵」，其實也是以農村和農民為基本舞臺和主力軍而展開的，所以才會有「土高爐」、「結牛牯」這些極具中國特色的奇異現象發生。在這幾年，作者身為一縣之長，歷練和經驗是綜合性的，也為其日後向依然與「農」密切相連的兩次工作重心的轉換打下基礎。那就是先轉到水利戰線，也是先「土法」建水庫，管水庫，到萬安、江口、羅灣以及一批「病險水庫」，這也是作者少壯時期最有作為也最具發展空間的10年，只要看看其工作內容和曾經直接面見的那些國家部委首長的故事，就可知一斑了。因為他是身負「建設」之責，堂堂正正地受命赴京聯繫工作。可惜的是，這個歷程被那場蕩滌整個中國大地的「文革」無情打斷，然後是一個十幾年的磨難期，但即使如此，作者的雙腳還是站在大地上，始終都在和「水」打交道。

再下一次的工作重心轉換，是從1984年開始，作者迎來最後一個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輝煌時期，只是從「蓄水」和「用水」轉到「保土」和「植被」。而且在那個時期，他們的一些觀念還是超前的，不少作為都有開創性，如結合江西實際情況，從大搞工程措施，滿山挖魚鱗坑轉到大搞植被建設，灌草先行，注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等等。因為此時國門已經打開，開始知道自己和外面的那個世界差距有多大，逐漸意識到國人自詡了多年的「地大物博」離現實愈來愈遠，人們開始反思前幾十年的各種建設和為這個「熱」那個「熱」付出了多少沉重代價，以及是否要考慮子孫後代還怎麼生活，如何「可持續」而不是一嚮而上地再搞掠奪性開發。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這個「土」這個「草」在城裏人眼裏往往是感受不到的，而缺了「土」沒了「草」的最直接惡果，也主要讓城市以外的廣大鄉村蒙難。所以水土保持的基本物件和關注空間，實際上還是「鄉下人」和農村。因此應該說，作者的畢生工作皆在「農」字上做文章，且做足文章。他的經歷是豐富和轟轟烈烈的，他所作出的貢獻無愧於那方鄉土和一個農家子弟的良知。也正因此，作者在引言中直白地說明留下這些文字的主要目的，是想告訴後人尤其是城市人要關心農業，尊重農民，注意搞好農村工作；如果不把「三農」問題處理好，就是忘本，就很危險；並盼望進一步保護農田，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村穩定。關注農村的前景，農民的未來走向與生存品質，無疑是全書的重心和貫穿始終的主線。

由此，我又聯想到前任省委書記到任後不久，曾對江西的幹部做過一個基本評價：「說農業，老半天；說工業，一袋煙；說經濟，不沾邊」——此話堪稱灼見，一語中的。但我們或許還可以追問一下，那就是江西的幹部為什麼會是這樣一種狀態呢？大家還不妨回憶一下：在近幾十年來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和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什麼時候讓江西不以種糧食為主業呢？江西什麼時候不是國家最為倚重的「糧倉」之一呢？儘管80年代以來「賣糧難」一次次成為江西人的難言苦痛，國家又何曾要過江西放棄水稻生產轉而

大搞工業建設呢？再往前想想：哪個中國人可以忘記50年代末期是從江西調出的巨量大米才緩解了京城和滬上的糧食危機呢？相比而言，江西不是那場「大饑荒」中人口自然減員最少的省份之一嗎？這些年來我在許多縣份都聽到當年的外省移民說同樣一句話：「遷到江西至少餓不死了」！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還清晰地記得，當年南昌街面上不少乞討者幾乎全都來自黃淮大地，包括開口就知道是我「老家人」的那些婦孺，那可是當年用奶水餵過解放軍傷患的老百姓啊！卻在和平安景因為人禍天災流落到江西討生活。應該說，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連貫發展且有內在邏輯的歷史過程，有一大批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做實事並變成內行的各級領導，所以江西的幹部們才諳熟於農業而無力也無暇及無需他顧，以至於臨近世紀之交時，因為整個外部世界大變，種糧的比價成本越來越高，並越來越不利於農民和種糧大省，城市與農村兩大板塊之間出現越來越大的斷裂時，只懂農業才日益成為不合時宜的一塊「短板」。但人不能提拉著自己的耳朵飛離地面，我們不應拋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時代制約，去苛求甚至否定上一代人的作為和辛勤耕耘。所以，如果還有人想真切瞭解這片國土上前幾十年是怎樣用盡氣力大搞農業的，那就請看看這本《實踐雜記》吧。

在此，我還可補充一個相關的新材料：今年春節那天，我與一個姻親的全家聚餐。其父1950年代在撫州地區的一個縣委任副書記，他清晰地回憶到：1958年在南昌市「江西飯店」參加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晚上招待全體代表看電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先安排了一部介紹計劃生育的宣教片。不料剛放映不久，坐在前排的省長邵世平就站起身來，大聲制止說：「不要放了！江西不搞計劃生育，江西是老區，人口不是多而是不夠。」於是這部片子就不了了之了。我深知這位老幹部絕無指責或貶低老省長的用意，只是回憶一段真實的往事而已。但我作為聽者，由此聯想到在當時反對計劃生育的恐怕絕非邵一人，而是還有一批從農村走出來的幹部。由此還可引人思考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當時已經感受到人口壓

力的恐怕主要在大城市，也許馬寅初先生更代表了這個空間的人群思想和利益；而在廣大農村（尤其是中、西部生產力還很低下的農村），則有其自身的利益要求——從政府層面看，這時急切地向農村要一切的產品和資源（糧、油、棉、菜、麻等，以及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不僅必須確保這些地區有足夠的勞動人手，而且也只有沿用傳統的、一家一戶的（兒孫）養老機制，去確保農村社會的安定。

每個人的歷史中都有獨特的「故事」，《實踐雜記》也是一樣。作為一個讀者，我尤感興趣的是其中許多自己過去不知道或不可想像的，覺得最有「存史」價值的那些內容。譬如說，作者回憶周溪村民過去會請「sang公」到家裏為孩子「跳sang」，掛的三幅神仙畫像分別是陳氏、林氏及李氏三位奶娘，使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在泰和山區也存在臨水夫人（又稱「大奶夫人」）崇拜，而學界一般認為這一信仰起源於閩西地區，是福建民眾崇祀的一個重要女神，祭拜臨水夫人的廟宇多在村落的水口邊，與社公社婆祭祀結合在一起。臨水夫人也是道教閩山派的重要女神，以能護佑生育聞名，所以過去多被視為婦女兒童的保護神，看來在周溪村也是如此，而且我猜想做祭祀的「sang公」也許是「社公」。又如文中提到過去鄉民一般請不起醫生看不起病，所以書後面羅列了一些當時常見的中草藥——就是這些不花什麼錢的方子，使那些體質還不十分羸弱的農村人能存活下來，長大成人，所以它們是很重要的。而這些中草藥沒能救活的，就是過去每戶都難以避免的「夭」、「殤」之人了。這種多生多死的人口淘汰機制，與我們今天的醫療保健和優生優育機制大相逕庭，更遑論「計劃生育」了。所以，不講明過去的那些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今天的年輕人是怎樣也想像不到和搞不懂的。

通過作者的詳細記述，我還具體而微地看到了在一個村莊裏，人們是如何按照《土改法》「搞土改」的，如何面對面又要艱苦地「發動群眾」，才知道「吃派飯」是以先劃分階級陣線為前提的，並由此而界定了「我」、「友」、「敵」，繼而再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步驟和措施，

一步步以外來的「主義」和「階級」理論在農村重建價值觀，重新確定財產關係和人際關係，並由此而決定了不同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其他的史實還如那個叫劉政群的國民黨軍法處處長，如何因為陳毅來信力保而得以不死；又如黨的高幹康克清的家庭成分劃分問題，是怎樣一次次被「糾正」的；再如劉瀾濤部長當年批給了江西10輛解放牌汽車，卻為何最終未能兌現；以及50年代為了防備臺灣「反攻大陸」，地方政府如何專門派員去崇山峻嶺中一一排查可供「美蔣特務」藏身的大小溶洞等等，這些就頗帶「秘史」味道了，在我們大學的教科書中是看不見的，非有親身經歷者說不出來。我還相信，讀者會在知曉這些事情本身之外，還可以咀嚼出其他的一些味道來。

我還想特別提到自己尤感興趣的一章，就是「全民大煉鋼鐵」，主體部份4,700餘字。作者是以指揮者和勞動者的雙重身份，見證了這場橫貫中國大地，至今非議甚多的一場「革命」。具體地描述了如何「得令」，如何發動，如何組織，怎樣臨陣磨槍，上哪兒去現場取經，實施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如何鼓動士氣，最後的實際效果如何，以及在今天看來應該怎樣給出一個基本評價等等，都是非常詳實和完整的，我相信即使是許多的領導幹部，都未必有過這種程度的經歷和見聞。如果作者有心把這一部份單行發表，以《我親身參與的泰和全民大煉鋼鐵》為題，相信一定是非常寶貴的中國現代史史料。其中特別精彩的一筆，就是當那場如火如荼的群眾煉鋼運動真的見到了一些「鐵」的時候，首都鋼鐵學院15名女學生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於是彼此對對方的希冀和感受，就出現了戲劇化的場面 and 效果。作者白描式地寫到：

開始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為她們從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人預料的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建築的土爐子，用人工拉風箱，人山人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石，感到很是

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洋高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操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需要從頭學起。

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和勞動——其實在當時的各個大學和政治中心，這才是要許多大學生「下來」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他們感受到「群眾運動」的偉大熱情和創造性。所以在回北京前的那個座談會上，她們談到的收穫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的全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相信她們也知道煉出來的全是「白口鐵」，只能製作犁頭、鍋壁和煮飯鍋，但這在「土法」冶煉的技術層面上說，恐怕也是到了極致，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些在當時並不重要甚至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改變：在這樣人山人海的「實踐」前面，她們能不震驚嗎？能信服嗎？她們其實已經被淹沒了，甚至可能已經在進行自我否定了，要知道就是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黨的主席毛澤東剛剛做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示，並作為大會文件發給全體代表學習。我甚至猜想，這批北鋼女大學生的到來，很可能就是這個批示的直接產物。若以她們當年20歲計，至今不過75歲上下，不算高齡，假設某人具有某種機會，按圖索驥地找到她們，讓她們回憶並寫下題為《我當年到江西泰和縣參加的大煉鋼鐵運動》的文字，我相信一定非常非常地有意思，有意義，一定可以和本書的相

關記載相互補充，相映生輝，或是顯現出不同的心境、感觸和反思來。

我在通讀過程中作了文字檢校，對部份重複或累贅之處做了刪減。但對作者隨手使用的客家口語和當地百姓的習慣性表述，如「前次革命」（土地革命）、「打肩擔」（挑擔子）、「操田」（耕田）、「牛皮糖」（紅薯脯）、「蝦蟲包」（油炸小蝦子）、「廟下」（小村廟）、「破墩而過」（公路從耕地中通過）、「長岔（xian）」（狹長的小盆地）及「橫排路」（到達一定海拔高度的山間土路）等等，則全部保留，以尊重其地方特色和區域生活原貌。尤其是「橫排路」一詞躍然紙上，令我聯想起在江西南部和周邊山區那些被稱為或自稱為「客家人」的鄉民口裏，也頻頻出現這個用詞，並引發我對其地理環境及其對當地民眾生產生活的規範和制約產生更多的興趣和探討。這些年來，我又多次伴隨妻子及其家人重返周溪村，與那裏的一些村民成了朋友，也目睹和體會了諸如高速公路這種現代化產物如何在給村民帶來很大便利的同時，也深深劃傷了那裏的蔥郁、幽深和空靈。這片與我結有深深緣分的鄉土，將繼續成為我理解江西移民和土著的歷史及其現實生活的試驗田和實習基地。

我還會常去吉泰盆地考察的。那裏的同仁如果再招待我吃烏骨雞，我會隨口提到1955年時這個雞種差點滅絕的事件，就是在武山汪陂村也僅存十幾隻。他們可能不信，我就請他們看《實踐雜記》。

2010年3月24日

定稿於江西師大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